



高涌泉
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，
最新的科普文集是《非物理不可》。

愛因斯坦也沒轍

他的社會正義理念經常背離所處時空的主流意見。

撰文／高涌泉

據說有些哲學作品有撫慰人心的功用，例如我在莊信正所著《文學風流》中讀到羅馬大政治家小加圖（Cato the Younger）在自殺前夕重讀《柏拉圖對話錄》〈斐多篇〉（Phaedo），此一篇描繪的是蘇格拉底服毒就義當天哲人與學生的對話，大約小加圖認為可以從中求得一點激勵。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收藏於法國羅浮宮的一尊小加圖大理石雕像：站著的小加圖眼睛正看著左手所拿的〈斐多篇〉（羊皮書？），垂著的右手則拿著將要刺向自己的劍，這讓我對於這個故事有了更深的印象。小加圖的例子可能戲劇化了些，不過閱讀哲學可以得到慰藉，應是不少人的經驗。

我多少也嘗過這樣的滋味，但在哲學之外，我發現閱讀愛因斯坦也可有類似的激勵作用。我指的不是愛因斯坦的科學論文，而是他那些為數不多的一般著作，包括他人收集整理的語錄。一個我喜歡的例子是愛因斯坦在1931年所寫的〈我的世界觀〉（The World As I See It），文章不長，他在裡頭闡述的人生、哲學、價值觀，很引我共鳴。其中一小段是：「善（Kindness）、美（Beauty）、真（Truth）這三個理想照亮了我的道路，一次又一次給我新勇氣以便能愉快地面對人生。如果不存在著理念相同的人、如果不能把心思置於客觀世界以及對藝術與科學永無止盡的追求，人生對我來說是虛無的。對於物質、外在成功和奢華的追求，我認為都是可鄙的。我有熱切的社會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，這和我沒有與其他人直接接觸的需求成了奇怪的對比。」另一段是：「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制度，每個人都會是被尊敬的個體，沒有人應被視為偶像。」

愛因斯坦的表白讓人聯想起大哲學家康德的名句：「有兩個東西充滿我心靈，我們越常去思索，就越感到仰慕與敬畏，這兩個東西就是頭頂上充滿星星的穹蒼與心中的道德律。」對我來說，愛因斯坦與康德兩人心靈有相同的寄託——宇宙與正義，這很能引我共鳴；我

閱讀愛因斯坦所獲得的激勵就來自這種同路人的感受。

然而抽象地談社會正義是一回事，如何在具體情境中認定正義何在又是另一回事。在這一點上，愛因斯坦所採納的立場，經常背離所處時空的主流意見。例如當他多數德國柏林大學的同事，包括好友普朗克（Max Planck）、哈柏（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）、能斯特（Walther H. Nernst，19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）等，在一次大戰期間簽署「93人宣言」（Manifesto of the 93），否認攻擊比利時，並宣稱若非德國的軍國主義，德國文化早就滅亡，而愛因斯坦是極少數敢公開唱反調的人。到了納粹興起，愛因斯坦當然更加與德國社會格格不入。他寫信給哈柏說德國沒有好人，除了少數幾位：普朗克60%高貴，馮勞厄（Max von Laue，1914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）100%。普朗克的正義感在愛因斯坦心中未獲滿分，原因應是普朗克多少遷就了納粹。

愛因斯坦流亡美國後，落腳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，與邏輯大師哥德爾（Kurt Gödel）成了好友，兩人常一起走路上下班。哥德爾或許過於執著於理性，時有出人意表的舉止，令一些人反而擔心他腦子是否有點毛病，愛因斯坦當然不認為如此。但他在1953年對助理說：「你知道嗎？哥德爾真的完全發瘋了」，因為「他投票給艾森豪！」艾森豪（Dwight D. Eisenhower）是美國二戰英雄，代表共和黨參加1952年總統大選，民主黨的代表則是文人史蒂文森（Adlai Stevenson），自由派的愛因斯坦無法理解哥德爾怎麼會支持一位右派軍人。

在科學之外，愛因斯坦一輩子念茲在茲社會正義，卻連周遭好友也無力感召，難怪他會於1936年，57歲之時，在封存於密封鐵盒之中的羊皮紙上寫下了這樣的留言給未來：

親愛的後世：如果你們沒有變得更和平、更有公義，而且大致上比我們更明理，那麼就下地獄去吧！在此表達這一點熱切期盼的是在下愛因斯坦。SA